

/// 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经典译丛

Academic Strategy

The Management Revolution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大学战略与规划

美国高等教育管理革命

[美] 乔治·凯勒 著
别敦荣 主译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G649.712

24

大学战略与规划

美国高等教育管理革命

[美] 乔治·凯勒 著
别敦荣 主译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青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战略与规划：美国高等教育管理革命/(美)凯勒(Keller, G.)著；别敦荣主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4
(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经典译丛/别敦荣·宋文红主编)
ISBN 7-81067-675-X

I. 大… II. ①凯…②别… III. 高等教育—教育管理学—研究—美国 IV. 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8296 号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青岛市鱼山路 5 号 邮政编码:266003)

出版人:王曙光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mm×1 168mm 1/32 印张:10 字数:240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定价:20.00 元

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经典译丛

别敦荣 宋文红 主编

特邀顾问：

菲利普·阿特巴赫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

著名国际高等教育与比较高等教育学家

罗伯特·伯恩鲍姆

美国马里兰大学终身教授

著名高等教育管理学家

潘懋元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

刘献君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

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总序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起源于清末民初新型高等教育创办之时,当时主要是关于国家如何举办新型高等教育、如何管理高等学校等的研究,研究人员多为与举办新型高等学校有密切关系的政府官员和高等学校的主要管理人员。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一批有识之士适应我国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要求,不仅在高等学校管理改革实践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而且也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论文,为建立我国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未能在理论层面上进一步深化,长期局限于有关高等教育政策制度的解释和阐述。70年代后期开始,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样,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也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突破了长期沉闷不堪、了无新意的局面,一批研究论文和专著的面世适应了高等教育管理拨乱反正、恢复秩序的需要。尽管不少学者为建立高等教育管理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一方面,高等教育管理改革对理论研究的需要十分迫切,研究人员不得不将研究视点放在实际管理工作中的重大具体问题上;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基础还较薄弱,研究成果的积累也并不丰厚,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科学方法和范式还处在探索和形成之中。所以,有关研究主要还是围绕高等教育管理的实际工作的需要,属于经验性研究,研究的选题大多直接源于宏观高等教育管理和高等学校内部管理的具体工作问题,有关专著的

写作体例则主要根据政府宏观管理高等教育的职能和高等学校内部管理工作的分工来设计。这也是一些学者所称的“工作体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逐步深入，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泛，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理性化，研究的抽象化程度不断提高，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成果。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引入了一些新的概念和研究范式，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比如，在90年代以前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文献中，极少见到“学术”这个概念。高等学校管理研究中，有教学管理研究、科研管理研究、教师管理研究、学生管理研究等，但是，却没有一个概念能够将高等学校的功能性活动全部概括进来，让人们从理论上对与它相关的管理问题加以系统研究。在实际的高等教育工作中，人们谈论“学术”的场合似乎只有“学术讨论会”。80年代中期以来，很多高校将传统的招待所更名为“学术交流中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齐集招待所，举行学术会议，探讨学术问题，发表学术成果，交流学术心得，因此，“学术交流中心”也还名副其实。但除此之外，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实际的高等教育管理工作中，极少有使用“学术”的概念的。自90年代中期开始，“学术管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主题之一，一批新的术语和概念，如学术权力、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民主、学术责任、学术自律等的引入和使用，一批研究论文的发表，几部相关研究专著的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颇为引人瞩目的影响。在高等教育管理实际工作中，“学术管理”也常常见之于高校的各种重要文件和领导的演讲报告中。

尽管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但是，应当承认，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还远没有能够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从学术成果看，虽然每年都要发表数千篇高等教育管理论文，出

版数量不少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专著,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形成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一门学科,如果没有各种学术流派的争鸣,难以称得上是成熟的学科。从学术队伍看,虽然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人员队伍不可谓不庞大,但绝大部分研究人员都是高等教育管理工作者,他们或就职于高等教育行政部门,或就职于各类高等学校行政管理机关,研究工作并非其主要工作职责,其研究工作或基于实际工作的感悟,或出于某些功利目的,如评定研究职称的需要等,因此,研究的专业化水平不高。在一部分专业研究单位,虽然有一批研究人员承担了有关研究生课程“高等教育管理学”(或称“高等教育组织与管理”)的教学工作,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人的主要精力并没有放到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上。学术队伍的专业化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基本条件,实事求是地讲,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人员队伍专业化的任务并不轻松。更为重要的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至今还没有形成一套规范的概念和研究范式。人们在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大多来自于高等教育管理的实际工作,缺乏抽象,缺少对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规范的、确定的解释和界定,因此,研究中表现出的概念模糊不清、歧见丛生问题十分常见。在研究范式上,不少学者曾经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借用系统论、控制论等学科的研究范式研究高等教育管理,试图将系统论、控制论等学科的概念及相关的分析模式移植到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来。应该说,动机不可谓不好,也不能说毫无成绩,但毕竟系统论、控制论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尽管它们的某些概念和分析模式对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不能套用。虽然 90 年代中期以来,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引入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新概念,一些学者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试图在研究范式上有所突破,但还不足以影响到对整个学科发展水平的评价。一门学科缺乏自己的抽象的概念体系,缺少自身独特的研究范式,就不可能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因此,有人认为,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还处在“前学科”发展阶段，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门学科由初创发展到成熟，同一个人的成长一样，需要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与环境。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发展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困难，但应该说，经过最近 20 余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初步具备了走向成熟的必要条件。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长期致力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具有比较雄厚的学术基础和条件。在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上，力图通过两个方面的努力作出我们的贡献。其一，组织一批精锐的学术力量，包括部分博士生和硕士生，开展高等教育管理原理研究，发展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基本理论。几年来，我们已经就高等教育管理学的数十个基本问题，组织研究人员从基本概念入手，以建立相关问题的研究规范为主要目标，开展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已有部分学术成果被写成论文发表。其二，翻译出版一批在国外有广泛影响的外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专著。应当承认，与有些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所走过的发展道路更曲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相对也滞后了一些，因此，国外高等教育管理学发展的一些经验和有关学术成果可供我们借鉴。“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经典译丛”（简称“译丛”）就是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

翻译出版“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经典译丛”的目的在于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提供一个参照。我们并不期望从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学著作中找到一套现成的能为我们所用的概念和研究范式，但我们相信，在一个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应当从国际化视野出发，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在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中不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使自身走向成熟。

本“译丛”从策划、选题、版权协商、翻译到出版，都体现了国际学术合作的精神。特邀顾问、美国著名国际高等教育学家、波士顿

学院终身教授菲利普·阿特巴赫博士和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管理学家、马里兰大学终身教授罗伯特·伯恩鲍姆博士为本“译丛”的出版作出了令人感佩的贡献。当我们最初就翻译、出版译丛的想法征求他们意见的时候,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十分热情、慷慨的支持。此后,每遇困难,他们总是鼎力相助,提建议、寄样书、联系作者、与出版社协商,并不厌其烦地解答我们的各种疑问。正是他们超越国界的学者精神,不断激励我们努力工作、提高翻译和出版质量,以便奉献给读者优秀的精神食粮。

本“译丛”的翻译、出版还得到了特邀顾问、我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潘懋元教授的无私关心和支持。我们清楚地记得,2002年9月当我们为译丛选题在厦门大学克立楼征求潘先生意见的时候,他鼓励我们要选好题,出精品,并慨然应允担任特邀顾问。在进入翻译和出版过程后,潘先生又多次要求我们,把好翻译和出版的质量关,以质量取胜。特邀顾问、知名高等教育学者刘献君教授在繁忙的行政和学术工作中,不时关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进度,帮助我们解决翻译、出版过程中的各种棘手问题,为译丛的翻译创造了优良、宽松的条件,使我们的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我们真诚地感谢他们为本“译丛”的翻译、出版所作的无私奉献!

本“译丛”的翻译出版还得到了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的全力支持。学术著作出版难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但在惨烈的图书出版市场竞争形势下,出版国外学术译著无疑是一项经济风险更大的投资。海大出版社领导站在时代大潮前列,以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为己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高瞻远瞩,有胆有识,“咬定青山不放松”,使“译丛”得以尽早呈现到读者面前。我们对他们的敬业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

别敦荣 宋文红
2003年6月

中译版序

1983年本书首次出版时,只有少数几所美国大学采用了战略规划来设计学校的未来发展。而今天,在美国的3 800所学院和大学中,却有一半以上的学校已经制定了某种形式的战略规划,或者正在制定一系列战略行动重点。在过去的20年里,在无数其他国家的大学里,战略规划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并被广泛采用。无须赘言,在世界各国大学运行和变革的管理上,战略思维与行动是新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

战略规划是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目的明确、面向未来的大学管理方式。它力图事先做好应对所预计到的困难的准备,更迅速地抓住和利用新的机遇与可能的变化。它要求学校正视来自其他学习渠道的竞争,并期望学校做到在学术上更优异,在财政上更强壮。同时,它又尊重大学的个性和传统,对于学校在全国各类大学中的特殊作用也持现实的态度。战略规划一方面要求强有力的管理,同时也重视学校最优秀教授的咨询和合作的意义。

尤其突出的是,战略是聚焦于外部的,要求运用一种环境考察的方式。如同最优秀的军事人员一样,战略人员要研究人口形势是怎样变化的,经济与文化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研究和教育的未来需求何在。如果大学了解大门之外的社会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以及其最大的需求是什么,或者近期将会有什么变化,那么,它就能通过内部恰当的杰出的教学和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自从《大学战略与规划:美国高等教育管理革命》出版以来,战

略规划与管理又有了一定的发展。其中之一便是要求更多地进行国际考察，因为外国政府在发生变化，竞争更激烈了，商业企业不再只是在地方市场出售其产品和服务，而是越来越多地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其产品和服务。现在全世界约 200 万学生在其他国家的大学接受教育，教授也可能迁移到其他国家的学校去工作。另外，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改变学生和学者的学习与研究工作方式。第三个发展就是，对于制定成功的学术规划的最优方法，人们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战略举措的产生既不能靠过度集权的方法，也不能靠过度民主的方法。它应当包含可测量的目标，必须有可靠的财政资源与之相配套。

许多国家直到最近才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人民的素质和智慧是现代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受过教育的人民往往更健康、更富有且更具忍耐性与和谐性。因此，培养最优秀的年轻人的大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最优秀的大学必定运转良好，且所从事的教学和学术工作不只是杰出的，而且是未来社会所急需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写道：“上兵伐谋”、“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

在今天这样一个变化不定的世界，大学不能因循守成，陶醉于往日的辉煌。在大学的运行中，应当更多地采用战略管理。这就是我在本书中所极力倡导的。

乔治·凯勒

2005 年 3 月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

原序

未来几十年将是美国大学和学院的重大变革时期，人们对这一预言已经习以为常。到 20 世纪 90 年代，高中毕业生将减少 1/5，这意味着高校之间将为日益减少的生源展开更激烈的竞争。高等教育支出也许将进一步攀升，如同过去 10 来年一样，增长速度高于消费价格指数。在吸引最杰出的年轻人加盟其学院方面，大学也将面临困难，因为大学空缺的教师职位在逐步减少。联邦政府可能进一步削减对学生的资助和对大学研究的支持。

较为乐观的方面是，计算机的新发展将带来教育过程的变化。大学研究对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业、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将发挥更关键的作用。成年人将以空前的数量回炉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外国学生将继续涌入我们的研究生院。

这样，我们的高等教育就面临一种新的形势。它包括一些新的威胁，同时也展示了一些新的机遇。在这种对未来把握不定的情况下，学院和大学领导及管理人员不能对他们的学校放任自流。现在必须采取审慎的、专业的管理。

遗憾的是，在许多学者看来，教育管理仍然就是消极地作出反应。结果，高等教育组织往往忽视管理理论与实践。而越来越多的高校出现的严重问题导致高校需要改进其管理方式。

在过去 30 年里，学者们对管理贡献了许多新思想。这一领域吸引了一些一流的人才，他们使财政、运行研究、决策理论、市场化与市场研究、社会预测、战略规划和组织理论等得到了新发展。

战略规划是管理领域中有重大潜力的新发展。这种规划不同于 10 年或 20 年前试验过的机械的和决策性的长期规划。战略规划主要考虑一系列新的因素：变化的外部环境、竞争环境、组织的优势与劣势以及发展的机遇。战略规划意在为组织提供一种感知环境变化的手段。设计这种管理活动的目的就在于帮助组织利用自身已有的优势，追求更优的质量。

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参与管理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是社会心理学家创建的，但它对未来的大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在未来的困难中赢得生存的机遇，学院和大学在管理方面必须更富有远见。但与此同时，大学必须保持其分权模式，利用教师的开创精神和思想创新能力。所以，这就需要有更积极、更坚定的大学领导——但它必须去谋求并且要包括教师的参与。

因此，学院和大学是幸运的，因为当它们需要改进其管理实践的时候，其自身所汇聚的各种新知识便可资利用。在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我们努力将最新的管理学智慧应用于学校。它使我们每年办学都有盈余，促进了我们的研究，使我们的学术计划中心更突出。教师的支持是十分关键的，尽管意见并非总是完全一致。我们不是惟一这样做的，其他学院和大学也采用了新的管理方式。在美国高等教育中，一场重要的管理转型革命已经开始。

本书基于一项全国性研究，探讨了美国高等教育管理转型问题。作者凭借其 25 年的教学、写作、管理和规划的经验，生动地描述了高等教育管理与规划的新模式以及产生新模式的原因所在。而且他为有意改进战略决策和提高长期生存能力的高校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我们社会的未来有赖于一个强大的高等教育系统，包括公立的和私立的。我相信，正如乔治·凯勒所主张的，优化的管理和战略规划对于保持我们的学院和大学的优势是至关重要的。

原序

本书颇有见地，成书于美国高等教育的转型时期，对于任何有志于把握变革和任何关注如何保持美国高等教育生机的人来说，都具有重大的价值。

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
理查德·M·赛特

前言与致谢

美国的3 100所学院和大学正在经历一场革命。这场变革的深刻性不亚于19世纪初期高等教育变革对袖珍型宗教学院的冲击,当时的变革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内容包括兴办大学、州立赠地学院、研究生院,发展科学研究、合作教育,任命院长以及在世纪之交开展专业研究生教育等。而且当今这场变革正在给高等教育界带来空前的恐慌、混乱和躁动。

人们通常认为导致这场变革的原因有二:一是大学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二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生育不足”。生育不足造成传统的大学生源数量急剧地、持续地减少,这使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出现生源下降问题。不过,还有其他更隐秘的,同样也是能量巨大的势力对这场革命发挥着重要影响。

概而言之,这场变革的促进因素及其结果都是可以认知的,而且由于数以百计的学院和大学的生存问题突然被置于危险境地,一场值得关注的逆向发展已经到来。数十所高校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应对其不断增加的纷乱,通过熟练的战略运用,平息纷乱。值得注意的是,主要的应对之策是现代财政和战略管理,即一种主要是由商业组织最先采用的应付市场威胁与机遇的手段。

尽管其他国家都认为美国管理学对新的巨型组织和迅捷的变革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但在美国各种主要社会组织中,学院和大学是惟一固执地拒绝采用现代管理方式的组织。一位著名的大学组织分析家将大学称作“有组织的无政府机构”,将其管理与决策

比作类似于“填充垃圾桶”的活动。然而，现在那种把大学看作是一种学者们可亲的、无政府的、自我改善的集体，另有数量不多的受人尊敬的管理人员处理不可避免的商业事务的观念正在被打破。一个有意识地进行院校规划的新时代已经到来。现代学院和大学已经不再是那种激烈地鄙视有效的经济和财政规划或者嘲笑战略管理的机构。现在，教授和大学管理人员正团结在一起共同设计规划教育计划、发展重点及开支，以保证未来发展，维持美国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最优秀地位。

学院和大学正在采用最先进的管理和规划手段，这些手段已经经历了政府和商业组织数十年常常伴随痛苦和代价高昂的尝试与错误的检验和学术研究。正如托尔斯泰·维布伦在其《德意志帝国与工业革命》一书中所指出的，德国人因进入工业化时代较晚而受益，因为他们把工业化早期粗糙、笨拙的机器抛到了身后；也如日本人，他们从半封建生活跃进电气化、国际金融和机器人时代，把早期的资本主义设备和思想抛到了脑后。教育机构虽然延迟采用了商业历史学家小阿尔弗雷德·查德勒所称的“看得见的手”，即自我意识管理，但仍能够引领大学和学院进入一个取得更辉煌成就的时代，而不是人们所预想的大规模衰败时期。

本书描述了美国大学校园中正在发生的管理革命。在书中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地阐释了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变革的性质之后，我接着阐述了我所发现的为那些更敏锐、更富前瞻性的学校所采用的新的管理手段，这些学校有规模大的也有规模小的，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我还简要地回顾了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情况，因为现在的规划已经不同于以往，甚至与几年前也不相同；它的最新形式是一种参与式战略决策，而不是以往的高度理性化的管理科学和系统规划形式，它被用来化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危机。

在第二部分，我试图解释战略规划的全部意蕴，以及学院和大学如何才能将战略决策引入校园生活，正如一些学校已经做到的

那样,将其纳入纷繁复杂的校园生活之中。我相信,在未来年代里,战略决策可能是几乎所有学院和大学都应当实践的管理手段。

本书的前半部分是描述性的,它描述了什么正在发生和为什么会发生。后半部分是规定性的,像一个医生那样建议正在遭受伤害的学校使用一剂良药。

一本关于一个大主题的小书免不了需要一些解释。尽管学院和大学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心组织,但关于学校的研究,尤其是对其管理的研究却仍然只是初步的。虽然一些学者如大卫·瑞斯曼、詹姆斯·马奇和克拉克·科尔等都作出了很优秀的开拓性研究,但关于学院和大学组织的主题仍然是一个被忽视的主题。另外,学院和大学运行与管理的研究需要一系列学科的参与,包括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以及一些更具交叉性的学科,如管理科学、组织理论与行为、营销学、预测与未来研究、决策理论、计算机科学、社会与组织变革研究、政府和商业规划的经验研究、财经管理、比较高等教育和规划学等。更重要的是,你还需要对那些怪异的、喜欢挑刺的、惯于做作的学者,创造性的人才和专业教师保持高度的敏感。本书结尾的“参考文献”来源于多种语言的事实揭示了方法论上的两难处境。

不过,正如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报道中就其努力所说的,我们应当尽我们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因此,本书是一个小小的初步的尝试,试图轻叩一个民族的脊梁,展示教育之林中的一个新希望,并指明掌握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某些良好的新的工作方式的方法。

高等教育中的管理观令许多学者不寒而栗而且恼羞成怒。诚然,大学完全不同于商业或政府机构。但事关国家活力的高校,聘用了上千的教师、研究人员与助理,运行着数以百万计的昂贵的仪器设备,年度预算开支达3 000万美元,绝不能再以一小型修道院自居,自诩享有免除开展严格的规划、决策和管理的特权。